

【对策研究】**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症结何在？**李静波¹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通过考察有关研究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历史上与现实遇到的诸多问题, 对于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探索, 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教育观念等维度对于农村教育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字: 农村教育; 经济发展不平衡; 教育管理; 教育投入; 教育观念

今天, 同城市相比, 我国农村教育尤其是乡镇教育发展明显落后。那么, 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症结到底何在? 通过考察有关研究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历史上与现实遇到的诸多问题, 我们认为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主要症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是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农村教育发展要以社会经济环境为基础, 社会经济环境制约可用于农村教育的物力和人力, 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 进而影响教育发展决策。²我国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 因为在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下, 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负责其直属学校的经费投入, 这样, 农村经济发展的好与差, 县级财政和乡镇财政收入的多与少就会对农村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及质量产生重大影响。而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差异大, 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教育发展也相当不平衡。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也是制约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首要因素(翟博语)。³我国基础教育的这种不均衡发展更突出的表现在城乡差别上(宏观上还有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别): 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 且农村人口比重过大, 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 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 教育质量和教育观念都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城市发展水平。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农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分散、效益低下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再加上我国存在人多地少,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较慢, 造成了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得到妥善安置,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

¹ 满海锋(1976—), 男, 民族汉, 吉林省长春人,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助教。

² 李少元著:《农村教育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年7月第3版, 第114页。

³ 《深化改革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笔谈), 引自《教育研究》, 2002年第2期。

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另外，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单一，是以农业为主，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且生产分散，不具规模，生产方式简陋，效益低下。“三农”问题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我们可以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为例，来说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加快，差距回复到改革初期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到1994年为止，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超过改革开放初期，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收入差距略有回降，但直到199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高于改革开放初期（附表2-1）。农民的收入增长已经进入缓慢增长阶段。

表2-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单位：元/人

年份	农村居民 纯收入	城市居民 可支配收入	城市居民比农村 居民高	城市收入与农村 之比
1978	134	343	210	2.56
1994	1221	3496	2275	2.86
1995	1578	4283	2705	2.71
1996	1926	4839	2913	2.51
1997	2090	5160	3070	2.47
1998	2162	5418	3256	2.51
1999	2210	5848	3638	2.65

数据来源：《2000中国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第1版。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不断下降，1996、1997、1998、1999、2000年分别下降了9%、4.6%、4.3%、3.8%、2%。我国在1999年共有592个国定贫困县，其人均纯收入仅为1374元，这一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9%，其中现金纯收入839.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4.6%。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靠城市工商业，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工商业的拉动。据统计，199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44%，37个特大城市（指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415.5亿元，占地级及以上城市的53%，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4%。同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86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⁴

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教育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使得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如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尤其是直接与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力资源——教育经费的分布在城乡之间极为不平衡。农村教育资源的总体情况不仅低于城市，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4年，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为17.73元，比上年的17.09元增加了3.74%；而同期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为10.98元，比上年的11.82元下降了7.11%；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50.86元，比上年的49.62元增长2.50%；其中农村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为29.67元，比上年的32.60元下降了8.99%。⁵可见，农村教育在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吉林省蛟河县新农乡为例，新农乡共有7万人，全乡有7所小学和一所初中，共有教师167人（小学123人，中学44人）。教师的月平均工资

⁴ 《2000中国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第1版。第249页。

⁵ 范国睿：《教育生态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30页。

为400左右,一年需要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的经费80.19万元,而2000年新农乡财政收入仅为58.12万元,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工资的发放只能是按时却不足额,教师的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教师缺编情况严重,且现有的优秀教师多数流失,转到经济待遇较好的县城或外地工作。该乡财政基本上就是一种“吃饭财政”,且大部分都用于教师工资的发放,而且学校基本没有可供使用的公用经费和基建费。新农乡第十七中学新任校长利用学校的农田基地进行创收,2001年收入四万元左右,这部分钱主要用于教师工资的补发和偿还当年该校因购买微机而欠下的债务(没有全部还清),因此,该校仍是在负债情况下维持基本运转,许多教师在该校成长起来后纷纷调到县城工作。这样,尽管这所初中在当地的升学率排在前面,但其辍学率却仍高达30%~50%。而新农乡中心小学由于没有创收途径,其办学条件更加不堪,教师工资的发放按时不足额(不足400元/月),学校没有语音室、实验室和语言实验室,校舍始建于70年代,却一直无钱维修,教学设备短缺,仅有的教学仪器设备也都已老化,该校校长自述道:“再加50到60万元也不够补”。而在辽宁省昌图县则因教育经费的不足出现如下现象,由于小学生源充足,学校靠收学杂费,状况勉强维持;而初中则因辍学率骤升(高达50%以上),由于生源少,使得学校的办学经费更雪上加霜,且学校没有创收途径,学校的办学条件更是简陋,教学设备奇缺。究其原因,据一位校长指出:“由于小学生没有劳动能力,家长往往送孩子来上学,而到初中年龄的儿童,由于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则不是在家务农,就是随父母去外地打工。我们这里的经济状况实在是不好,赚钱是人们最关心的事。上学不能挣钱,等上大学又不知要多长时间,且又没有钱供孩子上。”正如几位校长所言,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是导致农村教育难以健康发展的重要顽症所在,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农村社区基础建设也相应的落后,因此,它既无法保证农村教育经费的充足,同时也使得各种各样的其它形式的教育(非正规教育如社区教育等,笔者注)在农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农村教育越来越走入一个狭隘的空间。

另外,落后的农村经济既不能帮助教育走出困境,而在现实中,却又时常出现伤害教育的事件!这使本来就先天发育不良的农村教育再度雪上加霜!黑龙江省(兰西县)某县的一位教育领导说出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农村学校收学杂费,乡财政要扣5%,县财政也要扣5%,所以他们不但不想减轻学生和农民的负担,还想着收的越多越好!”。于是,一有机会上面便向下摊派教材,如青春期性教育(和生理卫生教育教材基本重复),(反)法轮功教育、心理教育、健康教育、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等,样样都有教材。而且还要相应的开设一定的课时,学生的负担明显过重,学校和有关教育部门已是叫苦连连!各种摊派在有的初中已经达到一年12000元之巨!该乡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极端的事件:某村主要领导向该村小学借去学杂费7000多元,始终没有还给学校。据当地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反映,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当地经常发生,该省农村小学都存在这个问题。贫穷已使得某些地方领导已把生财的主意打到了教育上来。在黑龙江省兰西县,据当地教育部门的领导反映,有些乡领导默许村干部收回农村学校的学农基地(约有13亩地,主要用作学生从事农业劳动实践和学校创收),再把它们卖给农民,从中获得好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农村经济和教育的关系:在沉重的经济负担下农村教育已难以顺畅的呼吸、透气!

另外,农村人口比重的过大也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我国人口基数

较大,不仅绝对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而且相对规模(在校学生数/总人数)也很大。据统计,1987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几个国家中,我国教育的相对规模居第二位,仅次于印度。1986年我国开始普照及义务教育,目前的教育相对规模更大。而我国经济实力又相对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穷国办大教育成为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客观原因。⁶据《中国教育年鉴》(1998)统计,我国共有小学学校60926所,在校小学生总数为139537993人,其中农村(包括县镇)共有小学学校576994所,约占全国的94.65%,农村小学生数为121032222人,约占全国的86.74%;我国共有普通中学(包括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77888所,在校中学生总数为63010260人,其中农村(包括县镇)共有中学学校63948所,约占全国的82.10%,农村中学生数为50601427人,约占全国的80.31%。而同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中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的部分为8119881万元,约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的27.53%。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我国目前人口总数达129533万人,其中农村总人口为8073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63.91%。全国农村接受初中教育的学生为42989万人接受小学教育的学生为45191万人,再加上庞大的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队伍,农村教育的整体规模十分巨大,而农村教育投入上的压力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可见,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及其教育规模的庞大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资源在城乡分布的不均衡、农村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凸现,已经构成了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桎梏。

二、农村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不完善是农村教育发展落后的又一重要症结所在。

如果我们对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症结进行深入的探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落后。我国农村的教育管理体制——“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一形成于80年代中期,它作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原则在农村的具体表现形式,曾对“两基”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历史作用不可否认。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情况的不断变化,这种旧的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农村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由此引发的种种症结已严重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如何完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消除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症结,实现农村教育的大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1、“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的历史成因与作用的回顾。

历史成因解剖。

我国的现行教育管理体制是根据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所制定的有关规定而产生的,它主要是针对当时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高度统一与集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病,试图进行改革并建立符合我国当时国情的教育体制。在此之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主要是在50年代形

⁶刘佛年主编:《中国教育的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0页。

成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一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它的基本特征是高度的统一和集中”⁷,“这一体制的弊病在50年代上半叶已经开始暴露,主要是地方的办学积极性不高,限制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要求”,针对这一弊病,“为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体制”,1958年中央分别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决定把管理权下放”。⁸在文革期间,这一教育体制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恢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教育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其主要弊端仍是统得过死,对教育的管理过度集中、统一严重妨碍了地方办学积极性的发挥,既无法扩大教育的规模,也不能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这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要求教育为社会提供大量合格的各级类人才的需要是不相符合的。正如《决定》所指出,“面对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面对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以往经验的深刻反思,国家决定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教育体制改革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充分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发展、壮大教育事业,以达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改革目的。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一直稳步增长,“农民从改革中所获得的收益到80年代中期也达到高峰,农民具有办教育的热情”⁹,而我国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在国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实行“分灶吃饭”的办法,¹⁰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同时也具备了办学的能力,达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因此,此时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顺理成章,十分符合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

在基础教育方面,《决定》指出“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为了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此项收入首先用于改善基础教育的教学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并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但不得强迫摊派。同时严格控制各方面向学校征收费用,减轻学校的经济负担”。基础教育体制改革顺利展开后,在全国很快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县及县以下的教育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即县管理高中阶段的教育和全县性综合教育机构,乡管初中以下的教育,村要积极参加所在地的小学办学工作。在城市,中等及中等以下的教育也主要由各区负责管理。这样充分调动和发

⁷刘佛年主编:《中国教育的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38页。

⁸刘佛年主编:《中国教育的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38页。

⁹ 杜育红:《论农村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创新》,引自《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第11期。

¹⁰ 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6版,第247页。

挥了各地方办学积极性,集资修校助学,极大地推动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¹¹由此在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上形成了“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模式,并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

历史作用分析

“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由于符合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特殊国情,充分调动了地方的办学积极性,打破了由中央政府单独包办教育的旧格局,“坚持两条腿走路”,开辟了“财、税、费、产、社、基”等多渠道来筹集经费,极大推动了我国“两基”目标的实现,农村教育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我国从1986年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到1995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按不同地区学制和儿童入学起始年龄计算)达到98.5%,女性和男性、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差距逐年缩小。全国初级中学(包括职业初中)在校生毛入学率达到78.4%,比1990年提高11.8个百分点。¹²另据《中国教育年鉴》(1999年)统计,到1998年为止,我国农村(包括县镇)小学学校数达576992所,农村小学在校学生数(包括县镇)为121,032,222人,农村普通中学(包括县镇)学校数达63948所,农村普通中学(包括县镇)在校学生数为5,815,044人,我国农村教育的相对规模(在校学生数/总人数)同以前相比在不断扩大。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获得了巨大发展。

另外,农村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仅1986年到1991年四年间农村自筹教育经费就达143.17(其中包括农村教育费附加120.36亿元,农村企业单位及个人资助22.86亿元),1991年仅农村教育费附加一项(48.21亿元)就占全年教育投资总数(731.50亿元)的6.9%左右。从1980到1990年十年间,通过各种形式筹集改造危房资金达400亿元,1986年至1990年共改造危房近2亿平方米,使危房比例由1986年的7.4%下降到1990年的1.86%,基本上实现了“一无两有”的最起码的办学条件。¹³在八五期间,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合格率分别达到97.6%和74.9%,比1990年各提高23.7%和18.0%个百分点,校舍危房率分别下降到1.8%和1.7%。

在农村的成人教育方面,这期间我国每年扫除文盲保持在400万人以上,青壮年文盲率由1990年的9.3%下降到7%以下。有3亿人次农民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形式的文化和实用技术培训。¹⁴农村乡一级农民技术学校覆盖率已超过70%,村一级农民夜校覆盖率也达到了30%。¹⁵成人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利地支持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农民科技致富找到了一条合适的途径。

事实证明,“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符合我国当时社会经济与教育自身的发展需要,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2)、现实局限性——面对发展出现的诸多弊病。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乡镇政府不堪承受之重

¹¹ 刘佛年主编:《中国教育的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45页。

¹² 《中国教育年鉴》(1997),《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第114页。

¹³ 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6版,第233页。

¹⁴ 《中国教育年鉴》(1997),《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第115页。

¹⁵ 刘佛年主编:《中国教育的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5页。

从历史上看,农村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随着对基础教育管理责任的不断下放,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又没有具体明确各级政府应负有的责任,这样,实际上在农村就主要由乡级政府承担了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据统计,我国乡镇财政和农民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60%~80%。而在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地方财政收入的80%~90%上交给中央和省级财政,县乡两级财政可用财力大幅下降,尤其是乡镇财力十分薄弱,16再加上农村义务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乡镇政府已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义务教育经费开支,农村办学体制与农村财税体制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已成为乡镇政府不堪承受之重。

分税制实行后,地方财政收入,尤其是乡财政收入减少,但因袭旧的办学体制,其所担负的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却没有相应减轻。在实行分税制后,由于收入划分不均衡,收入来源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大的税收政策种,都列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而留地方的几乎全是收入不稳、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且不易操作的小税种,因而导致部分地方财政收入下降。17再加上乡镇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能源、信息产业落后,稳定且增收潜力大的税源自然就少,乡镇财政能力的低下由此可见一斑。与此相对的是:1995年地方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60%以上,而地方税收收入总额占工商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仅达10%左右。18如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地方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财力有限而负担过重,教育又成了这些负担中最大的包袱。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农村学校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地方拖欠教师工资达十几个月之久,教师稳定的经济收入无法保障,师资流失十分严重,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也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农村中小学危房长期得不到维修,学生在一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学习,2001年末,在黑龙江省兰西县内就有一所小学因危房问题而无法进行课堂教学,一个班的教师因此而带领全班同学到一农户家里去上课,此间发生了一学生不慎被农户家里的马给踢死的悲惨事件!

农村教育的发展不能没有经济保障,而仅靠乡镇政府的财力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实行分税制后,国家征收了全国60%~70%的税收进入国库,而真正属于地方的税收只有30%~40%,19而在实行费改税的地方,由于取消了农村教育附加,而相应的教育转移支付实际上又难以到位,由此而产生的农村教育投入上的巨大缺口单靠乡镇政府根本无法支付,农村教育投入已是捉襟见肘。因此,农村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再沿用传统的办法,让乡镇承担农村教育的绝大部分,无疑会使农村教育投入如釜底抽薪,难以自保。许多有识之士就此提出的“以国家、省、市和县四级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的设想,在当前已不是空谈,而确实实是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和呼求!

责任转嫁——农民的负担过重

由于乡镇政府不堪承受农村教育投入之重,而又无法得到其它途径的补助,因此,把责任转嫁给农民便成为我国农村教育中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99年末在全国31个省区市抽取了18685个农户,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其中有25.5%

¹⁶ 《论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曾贱吉,引自《上海教育科研》,2002年第1期。

¹⁷ 《论分税制下的地方税体系建设》:冯绍伍、阮家福,引自《税务与经济》1995年第4期。

¹⁸ 《分税制下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思考》:罗小琴,引自《税务与经济》1995年第3期。

¹⁹ 《论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曾贱吉,引自《教学与管理》,2001年第11期。

的农户反映“村委会擅自扩大两费收取范围”，有40%的农户反映“以资代劳现象严重”，另有40.8%的农户认为“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负担重”。而其中从乱收费具体项目来看，在所有调查户中反映“教育集资”乱收费的农户占23.8%，反映“中小學生入学”乱收费的农户占28.9%，反映“农村建房”乱收费的农户占11.2%，反映“进行强行报刊摊派”的农户占11.7%。（《2000中国发展报告》）由此可见，农民负担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教育中的非正常收费。

农民除了每年都要上交的教育附加以外（占农民各项附加的1%~2%），还要时常承担乡镇政府的各种形式的摊派与集资，还要出工出力。这种现象既是经常性的，而尤其突出表现在普九达标检查期间，由于一些地方无法按期达标，于是便通过向农民摊派的方法来争取完成任务，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了。如在山东省嘉祥县满硐乡，因当地没有能力按期完成普九达标的任务，便采取突击达标的办法，向农民每人摊派人民币100元（按人头算，这样一家至少要上交300元），同时让农民出工建楼，这样才如期完成普九的任务。而当地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仅为1200左右（此为调查数字，而官方数字为2134元），一次摊派就收走了农民收入的1/12左右（即约占农民总收入的8.3%）。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满硐乡当年应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约占农民各项附加的1.5%）为80万元，实际却只能收上40万元，而真正用于教育上的只有20万，另外的钱都被乡镇政府挪用于其它地方使用了。这种不合理现象使得农民对义务教育不能不抱有成见，因为，根据义务教育的性质，义务教育应由国家出资举办，公民免费接受教育，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也应基于自愿的原则。一位基层教育部门的干部深有感触的说出了这个实情：“村管就是全村老百姓出钱，乡管就是全乡老百姓出钱！如果学校确实是不能上课了，有危房，老百姓也认可，但是国家的责任哪去了？这点我想不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国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资助助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经费。”

然而，现实却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农民被迫承担了一部分责任，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用于义务教育的集资又常被挪用它途，这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同时更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打击了农民集资办学的积极性。

“教育不同其他项目争比重要性，但无论何时，教育在公共部门的财政责任中居于主要地位”，²⁰然而，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根据现行的财税体制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再沿用“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并在实际上把教育在公共部门的财政责任完全下放到乡镇政府，显然是不合理的。“鉴于教育扩充过程中财政问题的日趋重要，因而，不管通过宪法还是其他成文法，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各级公共部门的教育财

²⁰ 《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1934~1996）》，赵中建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53页。

政责任予以规定”，²¹尤其是要突出中央、省、市和县级政府的财政责任，这样才能使各级政府部门的责、权、利统一，才能缓解乡镇财政的压力和农民的负担，真正调动乡镇政府和农民的办学积极性。

财权与事权相分离，学校的办学自主性受到限制

传统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中存在的另一个弊端，就是造成了农村教育中财权与事权的分离，学校的办学自主性受到限制，同时滋生了教育腐败。

在农村，县及乡镇所属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是由县及乡镇政府分别直接划拨的，其使用权归属于县及乡镇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县及乡镇政府不把钱花到教育上，学校也没有办法。因此，当地方政府面临财力有限的不利境况时，为了保护当地的主要部门的正常支出，截留、挪用和挤占农村教育经费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时常发生，尤其是在财政能力较弱的乡镇。以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黑龙江省兰西县为例，2002年国家划拨给该县的每生100元教育专项补助金，而据该县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反映，学生竟然一分钱也没有得到！于是出现了穷教育、富县官的咄咄怪事！正如当地的一位教育部门的干部所说的：“人穷都想自己管钱，钱一到手，多少都想截留，教育想办事，你得去求人家，去一次不行，得三番五次的去，每次去都得吃饭、送礼，就这样也不能把应得钱全部要回来，只能拿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实际上，农村学校能够从乡镇财政得到的经费往往只有教师工资这一块，而公用经费（在北方还包括取暖费，这笔费用在农村学校一般都需要2000元左右）则是要靠学校收取学杂费和自己创收来解决。校长也常因办公经费的不足而分散精力，一方面校长要抓学校的管理与教学，另一方面又得为学校争取财源而苦于奔波。至于学校的基建费则是常年没有的，往往是在学校校舍实在无法使用，迫不得已时才能从乡镇政府那里得到一些修缮费，而学校通常又无从过问其使用权，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学校校舍需要维修时，则由乡镇政府负责出钱找建筑公司来为学校维修校舍，学校则只需要等其维修过后去使用校舍。结果，在此过程中出现乡镇政府的一些领导从中收取建筑公司的回扣，建筑公司在维修时偷工减料，敷衍了事，校舍使用不久则又再度出现危房，学校成了最终的受害者。以兰西县红星乡一中（四年制初级中学）为例。在九十年代初，红星乡一中和二中的三、四年级合并到一中，这使一中的办学规模得到扩大，现有的校舍已不能满足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需要，根据学校的请求，在1994年由该乡政府出钱为其扩建新校舍约560平方米，并同时维修了原有校舍的房盖儿。但新校舍在当年就出现了裂缝，在1998年的一场暴风雨后，新校舍的房盖和前墙连接处断裂，成为危房，校舍停止使用；经维修的旧校舍房盖当年就被大风损坏，至今其上还压着几袋儿沙土，学生也仍在这些旧校舍中上课。据该校的王校长反映，当初乡政府派施工队来建新校舍时，曾派了三名监督员，但他们对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视而不见，当学校派出的唯一一名监督人员指出建筑中出现的问题时，乡政府的这三位监督员甚至偏袒施工队，并放言：“谁出钱，你们心中有数，听我们的就是。”王校长无奈地说：“如果我们学校有钱自己建校舍，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在是政府办学校，我们学校的一切都要通过政府，包括财政。”同时，我们在考查该乡东兴村小学时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小学校舍大门紧闭（无操

²¹ 《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1934~1996）》，赵中建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53页。

场, 只有一趟约 600 多平方米的校舍), 校内只有一名 26 岁的弱智青年在那里看门儿。进入教室内, 我们看到的是到处破漏的天棚, 不难看到建筑天棚的原材料竟是拇指粗细的玉米杆儿和一些灰土! 通过访谈, 我们得知这是由该村的党委书记一手操办的, 当学校出现危房时, 他已经逃走了! 如此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根源何在? 农村学校的办学自主性何在? 如此状况, 农村教育将走向何处?

另外, 由于财权与事权的分离, 在有些地区表现为客观上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 而农村学校基于自身的利益又渴望谋求发展, 于是有些校长便铤而走险, 通过不法手段敛财集资办学, 由此引发教育内部的腐败现象。有些甚至超过了向学生乱收费的违法违规行。以吉林省蛟河县职业高中发生过的校长非法敛财事件为例。该校前任校长因学校效益不好, 生源极少, 资金短缺, 便想出这样一个“集资兴学”的办法: 在新一届招生条件中加上向每人收取 6 万元人民币, 并以保证该届学生毕业后能够被分配到农村中小学做教师为回报。结果该校当年招收了 100 名学生, 非法敛财 600 万建起了学校的办公教学楼。当此届学生毕业时, 他又通过种种手段使这些学生都被分配到了农村中小学校做教师。这些学生其实根本没在职高进行正规学习, 只是想花钱买工作, 结果是他们到学校后成了只拿工资不上班的“皇族”, 他们的工资是通过挤占别人的编制而得来的, 而那些受害便是同年由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的师范生, 他们只能落得工作一年多而却没有工资可拿。此事最终遭到检举目揭发, 并得到妥善解决, 但却给我们留下一个沉痛的教训!

农村教育的责、权、利不得到统一, 财权与事权的分离势必使得农村学校的办学自主性丧失, 教育部门和学校成为一个被动的主体, 同时也使得地方教育部门同当地政府部门因教育经费而纠缠不清, 导致学校教育效率的降低和各种教育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制约着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农村教育观念的落后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主观症结所在。农村教育观念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对与农村教育有关的几对范畴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即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那个更应得到重视? 办农村教育是否就是城市教育的简单翻版? 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那个应更得到政府投入的优先权?

(1)、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谁更需要关注?

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谁更需要关注?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目前, 我国农村的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 72.39%,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4.68%, 大专以上比例仅为 0.32%, 农村的文盲率达到 13.8%; 城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28.6%, 城镇文盲率为 7%, 可以看出, 城乡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²²可见, 从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农村教育更需要关注, 而且需要特殊的关注! 在我国“三农”是与贫困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作为弱势群体, 他们应当得到特殊关注! 然而, 我们的

²² 《中国发展报告》(2000),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年8月第1版, 第224页。

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却并没反映出这种需要,农村教育仍在困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从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热点对象上看,主要是针对城市教育,而农村教育却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盲点所在,研究成果极少,尤其是对农村教育实践有重要影响、被成功推广的就更少。正如一位校长对几位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诘问:“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是素质教育吗?我看过很多有关素质教育的文章,但我仍找不到适合我们农村教育的关于素质教育的论述。那都是些离我们的生活和实际很远的论调。因此,我只好认为我们做的就是素质教育。”这位有胆有识的农村初中校长在他的学校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他自己的话:让到十七中学就读的每一位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他立下了这样的校训:以德立校,以法治校,科教兴校,质量兴校。他在展示学校发展风貌的相片册的扉页上写到:知识是打开愚昧枷锁的有力武器。就是这样一位农村初中校长,出于对农村的乡土之情和对学生的热爱,用自己的智慧办出一所地方小有名气的中学。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在那里似乎难以扎根,更不用说结出理论的果实。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往往都是在捡拾城市教育理论研究的残羹冷炙,然后硬套给农村教育,很少有人肯深入了解农村、农民和农村学生,真正为农村教育事业做出理论上的贡献。农村教育十分渴望有一批充满热情和富有智慧的理论工作者来为之描绘前进的蓝图!

另外,从现行的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上看,是以一种表面上的平等代替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在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下,往往是各级政府负责自己所属学校的管理与投入工作。这样,经济条件好的发达地区——城市教育发展的就快,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就慢;再加上农村所覆盖的地区较广、人口比重大,国家在整体经济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其给予充足的补助,这就造成城乡教育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因此,城乡儿童在受教育的机会、过程与结果上都不是平等的:农村学生的辍学率远远高于城市,可以说城市学生的辍学率应几乎为零;由师资水平的差距,使得在教育过程中学生能否得到公平对待上,城乡之间也是有很大差距;而最终由于教育教学质量和教育环境(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城乡教育在结果上——学生获得发展的程度——也是不平等的。

农村教育因其特殊的处境而尤其要求受到各方面的特殊关注。我们要在思想上形成这样一种理念:教育应该优先发展,而农村教育尤其要优先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经费供给上,农村教育都应得到优先考虑!韩国在普及义务教育初期,鉴于当时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家经济的承担能力,就曾对农村教育采取特殊关注的政策。他们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优先发展义务教育,把这些地方的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归到政府,而城市义务教育的普及则政府不承担责任。有鉴于此,我们在对待城市和乡村这两个经济差距显著地区的教育发展时,应该及早明确哪一个更应得到关注!

(2)、农村教育:不应是城市教育的翻版!

由于农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农村教育又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城市

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农村教育决不能仅仅是城市教育的翻版。城市教育相对重视学生的书本知识学习和兴趣方面的特长培养,而农村教育却不能完全以此为范式,刻意追求先进,农村教育更应注重学生的基础文化知识、职业技能和农业生产技能的培训,这是由城乡间文化生活方式、生活需要和生活水平不同所至。目前,我国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农村学校办学的“城市化”模式,它严重脱离了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又由于教学质量的低下,学生面临着“升学无出路,务农无技术”的尴尬境地。农村教育应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城市教育的简单翻版。

从农村教育的内容上来看。我国农村学校所使用的大多数教材和城市是一样的,开设的课程基本相同。教材中所介绍的东西往往是离学生很远的事物,这一方面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有障碍,另一方面又使一些学生产生向往城市生活、急于离开农村的想法。农村教育没能使农村学生增加对农村的了解,更热爱农村和准备为农村的发展作出贡献,而却使他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就是,他们认为上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离开农村。因此,有人感叹农村总是“人才辈出,江山依旧”!我们的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在几十年前就看到了中国农村教育的这个弊端“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²³笔者在同北方某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所农村初中的12名学生进行座谈中,当问到他们考上大学后是否还回到农村时,他们中只有一名女学生十分坚定的回答回来建设家乡,而其他的学生则直截了当的说,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不会回来的。他们还举出很多亲戚或邻里的孩子考上大学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的例子,并把这种模式当成自己未来追求的目标。当然,这其中并不排除城市因其特有的优势而产生的对农村学生的吸引力,而我们认为教育也难辞其咎。

针对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我们也曾作出不少努力,而却见效甚微。正在开展的农村校本课程只是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发达地区的农村有效果,而在中等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困难重重。因为在农村搞校本课程要比城市更难,它需要对本来素质就相对不高的农村教师进行再培训,或者是吸引新的师资,而且要有相应的农田基地,再加上教材等等,这需要一大笔资金,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办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农村特色的学校是难上加难。因此,农村教育多数都是城市教育模式的简单翻板。

另外,我们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开展的“三教统筹”和最近实行的“绿色证书”制度便着眼于农民的需要和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的许多做法都流于形式,没能真正达到目的,农村教育仍是以书本教育为主,升学仍是学生的唯一目标。这从农村学校的农田基地多数常年荒芜的现实就可看出。正是由于受应试教育的普遍影响,农村中小学仍是推行以升学为主的目标培养模式。职业教育在大多数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都是形同虚设,名不副实。农村学校(初中与高中)办的好与差,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其升学率的高与低。

²³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年1月第1版。

这样,实际上农村学校从其教育内容到其培养目标都偏离了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这不仅滋生了农村的新的读书无用论,而且,当农村初、高中的学生升学无望时,辍学就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对黑龙江省兰西县红星乡东兴村的辍学儿童进行家庭访谈时了解到,他们辍学的一重要原因就是成绩不好,升学无望,因此便回家待业以寻求其它的谋生途径。

农村教育的“城市化”模式可以通过了解农村教师的能力结构得到印证,我们现在的农村学校对教师的能力要求往往和城市的标准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针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技巧两个方面。陶行知对此早就有所批评,并指出乡村教师必须具备的能力结构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批判了那种脱离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空洞的书本教育,认识到农村教育必须要满足农民的需要,立足于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只有这样才能被农民所接受并达到改造农民和农村社会的目的。陶行知在这方面对农村教育的认识是最具有洞察力的,他深刻的理解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特征和中国文化的特点,认识到中国农民与农村社会的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针对现实,从农民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办农村教育,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在这方面陶行知对我们的启发也是巨大的,其重视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需要的乡村教育思想十分值得我们来借鉴和参考。

(3)、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孰先孰后?

在一个理想社会中,教育应始终得到重视,无论是初等教育或是高等教育。从我国颁布的有关教育的重大文献资料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我国在对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是优先发展基础教育,重点发展高等教育,两者同时得到重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方法是符合现代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一般策略的,这种策略便是抓两头(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带中间(中等教育)的中间路线。²⁴高等教育能够较快的把智力资源转化为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创造出价值,能够迅速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谋求发展,追赶发达国家,就必需重视高等教育;而初等教育却是着眼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地位,因此,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

然而,当一个社会还处在发展中阶段,物质产品没有得到极大的丰富,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时,教育的发展就会失衡,尤其是在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之间会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即在于: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既保证初等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主体其发展不受到影响,而同时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高级人才的作用又能充分发挥?单从国家角度讲,两者中偏重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对另一方的伤害,这根本上是受制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客观条件和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

从国家投入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应偏重于初等教育,其理由是一方面高等学校作为非义务教育可以进行适当收费(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不断提高,已成为高校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1999年部分地区的高校学费收入情况为,北京的收费标准为3200元,广东为4500元;另一方面是高等学校的创收能力要远远高于初等学校。1998年,全国高等学

²⁴ 陈桂生著:《教育原理》2000年3月第1版,第57页。

校办产业销售收入 315.62 亿元，其对学校总的回报为 15.04 亿元。25 再加上各种形式的社会捐资办学，高等教育的创收渠道和能力远远高于初等教育。

但作为事实，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目前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较高，我国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上却是相对重视高等教育的。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由政府举办的公立高等学校，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政府承担。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个表格中的数字对我国以往几年的三级教育投资分配进行分析：

表 2-2 1978—1998 年三级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元）

	大学生	中学生	小学生
1978	1843.9	35.6	12.6
1980	1753.4	60.1	23.2
1985	2472.3	128.5	47.3
1990	2832.0	210.0	91.0
1992	3887.0	300.96	139.35
1993	4669.88	364.27	162.80
1998	6775.19	610.65	370.79

资料来源：1990 年以前数字来自《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 年，统计出版社 1990 年版。

1990 年及以后数字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1992、1993、1994。

转引自：王善迈著《教育投入与产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二版，第 151 页。

（其中 1998 年来自《2000 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 4 月第 1 版。）

表 2-3 1990—1994 年财政拨款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

	1990	1992	1994
高等教育	24.03	23.41	21.05
中等教育	36.22	36.12	39.16
初等教育	32.87	32.25	33.27
学前教育	1.13	1.22	1.31
其他	5.95	6.00	5.21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1992、1993、1994 年版。

转引自：王善迈著《教育投入与产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二版，第 151 页。

从上表中的三级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与初等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的比值尽管从整体上看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到 1993 年为止，前者仍为后者的 25 倍，到 1998 年为止，前者仍为后者的 11.1 倍。且 1998 年生均预算内经费，除小学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分别增长 1.12% 和 0.94% 外，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则同上年相比下降了 14.22%。²⁶

从财政拨款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来看，由于初等教育的规模远远大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所比例仍过大。90 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投资 80% 以上来自财政，而中小学教育投资只

²⁵ 《2000 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4 页。

²⁶ 《2000 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5 页。

有60%来自财政。27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²⁸从目前高等教育扩招来看,1999年共有高等学校1942所,比上年增加49所,其中本专科招生数从1998年的108.4万人扩大到159.7万人,增加近52万人,增幅为高达47.3%;同期成人高等学校招生数从100.1万人扩大到115.8万人,增加15.7万人,增幅为15.7%,研究生共为23.4万人,比上年增加17.6%。这样,1999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总计达到742.3万人,292000年,这一数字已达到了939.85万人,高等教育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如果高等真正实现了大众化,而不改变国家财政拨款在三级教育结构中的比例,那么这种教育投入比例的不合理性将更加突出,初等教育尤其是农村初等教育的发展将受到更大冲击。

另外,通过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在发展中阶段对待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的经验也可以看到,大多数国家在发展阶段往往是注重和优先发展初等教育,注重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投入,以满足国家在发展中急需的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而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转向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式来看,由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人口众多,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任務还很艰巨,因此,国家在财政上应一以贯之的向初等教育倾斜,这对于我国初等教育尤其是农村初等教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否则,农村初等教育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²⁷ 王善迈著:《教育投入与产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2版,第153页。

²⁸ 《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第15页。

²⁹ 《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第9页。

Why the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dropped behind?

Jingbo Li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and the questions from the history and the practice, explore the reasons of the dropped behind of rural education, and analyse the restrict factors from some facet ,such as economy imbalance develop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the notion of rural education.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economic imbalanc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investment; notion of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4-04-01

作者简介: 李静波 (1977—), 男, 民族汉, 吉林省长春人,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硕士。